

主题讨论：中非关系研究瓶颈：探索与突破

进入新世纪以来，某种程度上得益于中非关系快速发展所引发的各个层面的重视与关注，中国的非洲研究形势趋好，具体体现为各类研究机构纷纷成立和研究队伍不断壮大，各种形式的相关研究成果纷纷面世，正所谓“乱花渐欲迷人眼”。这一方面体现了国家从政界、商界到普通大众的需求增长，也体现了中国非洲问题学者“咨政”意识的萌发与成长。在这些“丰硕”研究成果的背后，一些问题也逐渐显现：学者们一拥而上，低水平重复研究现象严重；有些学者缺乏对中非关系的长期跟踪研究，只是偶尔为之；孤立地研究中非关系，缺少与研究新时期“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有机结合，缺少对中非关系所面临的国际环境的深入观察；一些成果停留在中非关系的浅层次宏观表述，缺少对相关具体领域和国别的深入研究；只对领导人言论和有关对非政策进行简单阐释，缺乏对相关言论和政策内涵的历史回溯和前瞻性解读。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可以说，中非关系的研究已经面临瓶颈，急需进一步开拓与创新。

本期刊发的几篇文章，在选题、深度、方法和资料方面都有一定的创新和突破，是作者和编者共同在突破中非关系研究瓶颈方面所做的一些尝试。张春的文章认为，要推动中非合作再上新台阶，必须重视政策空间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在合作中有机结合中国国家发展战略、对非战略与有关的非洲地区和全球发展战略规划；李安山的文章聚焦于中非官方交往之外的民间交往，认为中非民间交往的本质是文化馈赠、文化互鉴和文化融合，而理解对方的文化是中非建立良好关系的基础；罗建波的文章则从非洲国家所面临的各种国家治理难题入手，探讨中国如何在治国理政的成功经验方面为非洲提供有益的帮助，为中非之间如何开辟新的合作领域提供了新思路；刘中伟主要从美国政、学两界的视角审视了中非合作对美国对非政策所产生的影响，其关于中美之间在非洲事务上开展合作的建议值得关注；刊发在“学术评论”栏目的张宏明的文章回顾和总结了中国的非洲研究机构在“智库研究”方面的历史、成绩和问题，体现了中国非洲问题学者自我审视的精神和在当前“智库热”形势下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上述作者所做的努力，不仅体现了中国非洲问题学者在当前非洲研究表面繁荣之下的热情，更有一份难得的冷静和清醒。中国的非洲研究永远在路上，中非关系的研究更是如此。